

# 亞聯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高等教育

徐炳三

[提 要]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是一個針對亞洲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組織,它以 1922 年成立於紐約的“中國聯合大學中央辦公室”為開端,此後雖幾經改組和更名,但服務於中國教會大學的宗旨從未改變。該組織在 1951 年撤離中國大陸,轉而服務於港台地區和亞洲其他國家。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重返大陸。秉承宗教與教育分離的原則,亞聯董在圖書館建設、教師培養、客座教授、文藝交流、科研扶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000 年以後,亞聯董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努力將中國納入亞洲高等教育合作網絡。近年來,亞聯董以全人教育為核心理念統攝全部活動,中國始終是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亞聯董的方針和工作模式,契合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體制,順應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從而被中國社會所認可,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關鍵詞] 亞聯董 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 教育方針

[中圖分類號] G6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99-10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亞聯董”)是一個針對亞洲地區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組織,總部設在紐約。自 1922 年初創以來,亞聯董在亞洲、尤其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 2018 年,亞聯董與 14 個國家和地區的 80 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其中包括港澳台在內的中國高校達 29 所,所佔比例超過 1/3,且大多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高校,足見該組織與中國高等教育的密切關係。然而,學界對亞聯董的研究多集中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對之後的探討極為薄弱。<sup>①</sup>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在華方針和發展態勢如何?在中國高校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其理念和政策與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是否契合?釐清相關問題,有助於我們對改革開放格局下在華西方文教組織的精準評判,有助於加深我們對中外教育契合點與合作機制的認識。

## 一、亞聯董重返大陸的歷程

亞聯董是近代西方基督教會在華高等教育發展與合作的產物。1920 年以前,西方新教差會在華創辦了 16 所教會大學,後合併為 13 所。這些大學隸屬不同差會,各自為政、重複建設、資源浪費現象嚴重。為了加強校際協作、提升教育質量和獲取穩定的辦學經費,金陵、燕京、齊魯三所大學的託事部,於 1922 年在紐約成立“中國聯合大學中央辦公室”,負責保存函電、帳目、檔案及採購等行

政事務,其他教會大學隨之加入。1925年,各校聯合創立“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與促進常設委員會”,統籌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協調各校募款活動。<sup>②</sup>1928年,委員會制定促進教會大學聯合的《通盤計劃》。1932年,中央辦公室改組為“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執行辦公室”。<sup>③</sup>1945年,福建協和、金陵、華南女子學院、華西、燕京、金陵女子學院等6所大學的託事部率先合併,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1950年會員增加到11個。<sup>④</sup>

亞聯董早期各機構在教會大學募款、教育政策制定、圖書館建設、教職人才培養、教育資源共享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抗戰前後,亞聯董通過募款,使西遷中處於極端困境的教會大學不至停擺,並為戰後教會大學回遷復校盡心竭力。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教會大學於1951年被政府接管,亞聯董隨之撤離大陸。1955年,“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sup>⑤</sup>亞聯董將其工作範圍擴展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首先支持香港和台灣新建教會大學,其後支持韓國、日本、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高等教育。20世紀50~80年代,亞聯董與亞洲數所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亞聯董雖然被迫撤出大陸,但從未放棄回歸的希望。1972年尼克松訪華,扭轉了中美對抗局面,亞聯董託事會隨即發表聲明,表示隨時準備為中國大陸提供服務。1978年12月,中美同時發布建交公報,為亞聯董重返中國大陸創造了條件。

聯董重返大陸的障礙是索賠問題。1966年美國政府出台“中國申索法”,要求中國賠償美國在華財產損失,並逐年補償這些財產的利息。在美國財政部的要求下,亞聯董對華索賠被提上日程。亞聯董多數託事會成員反對索賠,因為當年教會大學為中國人的利益而創辦,這些校園依舊用於中國高等教育,要求中國人為此賠款有違道義。然而,迫於內外壓力和現實考量,最終亞聯董接受了索賠建議。1979年3月,中美兩國達成協議,中國在六年內共向美國支付8,050萬美元賠償金,其中亞聯董所得份額為917.7萬美元。<sup>⑥</sup>索賠問題的解決,為亞聯董重返大陸掃除了障礙,也為其在華資助項目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索賠問題解決後,亞聯董致力於建立新型的對華關係。1980年初,亞聯董派出一個由23人組成的代表團訪華,亞聯董總裁、哈佛大學前校長Nathan Pusey博士任團長。代表團受到中國教育部和中華教育會的熱情接待,同時訪問了12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代表深入交換意見。代表團的訪問取得突破性進展,Nathan Pusey最終與中國教育部簽署了一項總體意向性聲明,亞聯董在華發展計劃得到中國官方認可。隨後,胡喬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代表團,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對此加以報道,標誌著中國政府初步接納了亞聯董。<sup>⑦</sup>

得到中國政府的承諾後,亞聯董立即著手制定工作方案。全體成員一致認為,亞聯董應該首先考慮中國高等教育需求,並為之創造發展機會。亞聯董與中國其他組織不存在競爭關係和重複性工作,而是試圖找到雙方有效的合作方式。鑒於中國政府對自然科學的強調,亞聯董將重點放在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方面,以避免重複和激發中國民眾對價值觀及倫理問題的熱情。亞聯董下屬的中國問題委員會最終確定從四個領域開展工作,分別為招收和支持中國學者在北美高校任教、為中國高校教職員提供海外研究生學習的機會、協助中國高校圖書館採購書刊、促進中國與亞洲及北美高校之間的師生交流等等。<sup>⑧</sup>

亞聯董在1980年代初期開展的活動帶有探索和嘗試性質。以1980年為例,該年計劃包括多倫多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研究項目,西蒙斯學院與武漢大學合辦的圖書館學教師發展計劃,北京中央樂團與波士頓交響樂團講習班計劃,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與休斯頓芭蕾舞團聯合培訓項目,西蒙斯學院某教授赴華演講計劃,中國高校教師獎學金支持計劃等。這些項目並

無明確指向,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為了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該年亞聯董總裁再次訪華,與中國教育部和建立關係的高校深入交換意見,此後又多次派代表赴中國各地考察。根據中國政府和教育界反饋的意見和建議,亞聯董不斷修正並推進高教合作計劃。截至1985年,亞聯董已經與數十所中國高校建立聯繫,為中國項目贈款244.1萬美元,這是除福特基金會外,西方民間機構對中國最大宗的資助。此外,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為赴海外學習的中國高校教師減免學費總額高達100萬美元。<sup>⑨</sup>

亞聯董重返中國大陸的前五年是相互建立信任的階段。初期中國政府對亞聯董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存在顧慮,雙方的合作並非一帆風順。但亞聯董通過自身的良好表現,逐漸贏得了中國政府的信任和好感。1985年6月,亞聯董代表胡昌度拜訪中國教育部官員,後者對亞聯董的管理計劃表示歡迎和支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嚴濟慈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接見了胡昌度,關於亞聯董的新聞隨即被中國媒體廣泛報道。同年10月,亞聯董派出以副董事長Ruth A. Daugherty為首的六人代表團訪華。代表團訪問了與亞聯董聯繫密切的7所大學,並與許多管理者、教師和學生個別交談。在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李滔的安排下,代表團與中國教育官員進行了實質性會談。雙方回顧和重申了1980年簽訂的協議,中方對亞聯董誠信地踐行1980年協議表示高度讚賞。<sup>⑩</sup>由此,亞聯董正式在中國大陸站穩腳跟。

在20世紀80年代的十年中,亞聯董為中國大陸各類項目提供經費575萬美元,與100多所大學和機構建立聯繫。亞聯董使565名中國學者獲得海外高級培訓的機會,通過研討會和工作坊提高了大批教師的專業素質;派遣213名北美學者到中國發表演講和教學,資助25位來自亞洲國家的訪問學者;幫助中國建立兩個大型區域學術圖書館和一些較小的圖書館,為大約50名圖書管理員提供培訓,增強了3所高校圖書館專業的實力。<sup>⑪</sup>

## 二、在華方針之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以1990年和2000年為節點,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不同時期亞聯董在華方針呈現出不同特點。

(一)20世紀80年代:淡化自身的宗教屬性,重點支持中國亟需發展的高等教育領域,積極開展與中國官方及教育界的對話與合作。

第一,淡化自身的基督教特質,政治立場與中國保持一致,以確保在華順利開展工作為第一要義。亞聯董在1980年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協議中明確表態,其在華活動純粹以發展教育為訴求,不涉及任何宗教利益;亞聯董無意重建已成為歷史的教會大學和新建其他教會大學。遵循這一原則,亞聯董從不在中國開展或資助宣教活動,與中國基督教會的接觸也停留在非正式層面。<sup>⑫</sup>面對華南女子學院和金陵女子學院兩所具有教會背景的大學的復校要求,亞聯董並未在復校過程中採取行動,只是在復校後在一般性項目上給予有限支持。<sup>⑬</sup>1983年4月,台灣教育界紀念亞聯董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一度引發誤解,亞聯董隨即表態並未派員參加,亞聯董決不支持台灣立場。<sup>⑭</sup>

第二,移植早期在亞洲其他國家開展的計劃,多類型項目同時起步,並根據中國國情重點資助以圖書館為代表的少數項目。該時期亞聯董在教師發展、客座教授、文獻建設、藝術交流等諸多領域均有嘗試,但投入力度最大的還是文獻建設,尤其是對四川和陝西兩個圖書館的支持。上述活動很大程度上是早期亞洲其他國家相關計劃的移植或延伸,帶有探索性質。亞聯董在華投入最大的圖書館計劃,同樣也是亞聯董在亞洲各國發展的重點。高校教師赴美攻讀學位、亞洲與歐美藝術交

流、客座教授與訪問學者等計劃早期也在亞洲高校廣泛推行。亞聯董試圖將中國納入其亞洲整體事業的軌道中，同時積極探索與中國合作的獨特性和側重點。<sup>⑮</sup>

第三，鼓勵中外中國教育工作者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努力實現中外交流的平等與平衡。亞聯董相信，鼓勵知識分子相互對話與提供經濟援助同等重要，嘗試就知識的性質、東西方教育的目的、現代化對人類價值觀的影響等哲學問題與中國學者對話，為此多次提議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組織召開全國哲學會議。直到 1987 年會議才獲得批准，次年 10 月在南京大學舉辦，亞聯董提供經費支持。共有 32 名中外學者參加了這次名為“通向社會進步的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成績遠遠超出預期。<sup>⑯</sup>此外，在 1986 年亞聯董制定的十年計劃中，明確表示要努力實現中外交流的平衡，滿足中國學者與西方分享中國文化的願望。<sup>⑰</sup>

(二)20 世紀 90 年代：堅持在中國教育體制下開展工作，工作內容多元化並有所側重，一視同仁地對待有無宗教背景的高校。

第一，注意在中國法律和教育框架下，與中國官方和民間公益組織合作開展工作。該時期亞聯董依然比較審慎，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聯繫密切，做出重要決策前往往徵求協會的意見和建議。比如 1990 年代後期，亞聯董在西藏、新疆、寧夏、甘肅、內蒙古等邊疆地區的獎學金計劃，得到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的鼎力支持。即便如此，亞聯董對在西北開展工作仍持審慎態度，同時諮詢和探索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以確保不觸碰政治紅線。<sup>⑱</sup>1990 年代亞聯董在中國最緊密的合作夥伴是 1985 年成立於南京的愛德基金會，亞聯董經常以愛德基金會為依託開展活動，包括教師獎學金、訪問學者、學術會議、出版翻譯等各類項目。亞聯董注入愛德基金會的資金超過資助同時期中國任何其他機構。

第二，在華項目呈現多元化趨勢，在外語培訓等方面投入較大，同時出現新的關注點。1988 年亞聯董曾提出邊疆地區支持、英語培訓兩個重點扶持計劃，前者由於種種原因在 1990 年代後期才有所推進，後者則成為 1990 年代前期亞聯董工作的重點，資助比例超過同時期其他項目。<sup>⑲</sup>除了兩個重點規劃外，亞聯董對中國高校的支持主要體現在資助教師到海外訪學、資助北美客座教授來華講學、資助大學院系開展項目三個方面，投入比例各佔年度資助總額的 1/3。<sup>⑳</sup>三大項目多為 1980 年代相關計劃的拓展和延伸，而同時期宗教研究、女性研究、校際合作計劃等則是新的增長點，總體上看，該時期亞聯董在華項目類型更加多樣。

第三，在亞聯董內部不諱言自身的宗教特質，但對外依然強調將一視同仁地對待有無基督教背景的地區和高校。1999 年，亞聯董制定新的願景聲明，對存在和不存在教會大學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兩套提案評估標準，分別針對基督教機構和非基督教機構，但強調對兩類機構公平對待。即便存在標準，亞聯董也將首先考慮提案的質量、水平、成本效益和適應性等原則。當然，亞聯董成員在項目評估時，有時會不自覺地受到基督教標準的影響。為避免此種情況，有人建議為中國量體裁衣地設計一套專門的標準。<sup>㉑</sup>

(三)2000~2018 年：重點支持中國大陸實力較弱的高校或專業，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試圖將中國納入亞洲高等教育合作網絡。

第一，亞聯董強調自身的亞洲特徵，積極推進組織機構和人員構成的亞洲化。新世紀之初，亞聯董領導人一致認為，亞聯董不應該只是一個美國組織，而應該成為一個在亞洲工作、基於亞洲人的組織，本著這種認識，亞聯董開展了一系列改革。2001 年，亞聯董在香港設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學院”，逐漸覆蓋紐約總部在亞洲的全部功能。亞聯董邀請更多亞洲人加入託事會，至少每兩

年在亞洲召開一次董事會會議。亞洲託事會成員比例不低於 50%，包括中國代表。他們有權出席委員會會議，充分參與亞聯董事務並做出貢獻。從 2001 年 11 月開始，所有託事會成員加入一個計劃委員會和一個行政委員會，由此大多數中國計劃委員會成員也將是託事會成員。<sup>②</sup>

第二，將在華項目的重點設定為加強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等方面。2001 年，亞聯董審查會議建議扶持中國欠發達地區高校的發展，並在次年亞聯董會議上通過。經考察，貴州省各級師範院校被確定為亞聯董重點資助單位，同時兼及中國西部其他省區。主要工作方式是亞聯董撥款，支持西部高校教師進修訪學和加強中國西部高校之間的聯繫。<sup>③</sup> 審查會議的另外兩項重點分別是支持中國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亞聯董認為，支持宗教研究主要是為了教師發展，但也包括支持客座教授、學術會議、宗教教科書、參加兩會的大陸宗教學者等內容。亞聯董也資助一些在香港開展的中國宗教研究項目，以確保中國大陸對宗教學術研究的資助總額高於其他項目。<sup>④</sup>

第三，強調將中國高校融入亞洲高等教育體系，加強亞洲高校間的聯繫與合作。針對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高校互動較少的現實，亞聯董通過促使中國參與亞洲共同項目的方式，努力建構中國與亞洲各高校之間的聯繫與合作網絡。亞聯董在制定計劃時往往將全亞洲通盤考慮：2003 年以管理計劃、合作夥伴計劃、支持計劃三大類型統攝全部項目；2012 年以後則以全人教育理念為核心，將亞聯董全部項目歸類為高等教育領導力發展、促進教學研究的教師發展、校園夥伴計劃、亞洲文化與宗教計劃、特別新計劃五種類型。<sup>⑤</sup> 該時期亞聯董從全域角度對亞洲計劃普遍性的重視，遠超過對個別亞洲國家特殊性的關注。建構亞洲高等教育體系成為亞聯董新世紀以來的著眼點。

### 三、亞聯董在華主要活動

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內容和重點在不同時段有所差異，但總體上可概括為資助中國教師進修的教師發展計劃、資助北美學者來華講學的客座教授計劃、資助中國高校自身主持的計劃三個類別。其中第三類內容最為豐富，涵蓋了圖書館發展、外語教學、宗教研究、女性研究、藝術交流等諸多方面。因訪學教師和客座教授可能涉及各個領域，三類項目難免會有所交叉。現就亞聯董在華活動擇其要者加以介紹。

#### （一）教師發展計劃

教師發展計劃是亞聯董長期堅持的卓有成效的項目。1980~1990 年，亞聯董共資助 565 名中國學者赴海外培訓。<sup>⑥</sup> 1991 年，魯斯基金會捐贈 30 萬美元，亞聯董用這筆經費繼續支持中國訪問學者新項目。<sup>⑦</sup> 1993 年，亞聯董每年追加 8 筆贈款。1993~1995 年間，亞聯董每年支持的訪問學者大約在 34~35 人左右，整個 1990 年代年均大體維持在這個規模。從 1994 年開始，亞聯董為全部在美學習的教師購買醫療保險，平均每人增加 600 美元左右。<sup>⑧</sup> 從 1997 年開始，亞聯董為每位訪問學者提供 2,000 美元的探親補助。亞聯董為學者提供資助期限為一年，但如果教師所在高校沒有本科課程，他們可獲為期兩年的資助，用於在海外攻讀學位。<sup>⑨</sup> 2000 年以後，亞聯董除以往資助計劃外，還通過研究員計劃等項目提高中國高校教師素質。

#### （二）客座教授計劃

客座教授計劃與教師發展計劃一樣，是亞聯董從未中斷的保留項目。梅隆基金會從 1983 年開始向亞聯董提供資金，資助美國的傑出學者到中國高校做客座教授。八年間資助額度超過 67.5 萬美元，共支持美國 36 所大學 24 個學科的 173 名學者來華，在中國 48 所院校講學或授課。<sup>⑩</sup> 梅隆基金會只針對美國學者，因此董事會利用其他資源，資助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等國家

和地區的學者來中國大陸做客座教授。作為合作項目，亞聯董提供學者往返交通費和薪酬，中國高校提供住宿，有時也提供酬金或津貼。客座教授所涉專業涵蓋語言學、圖書館學、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數十個學科，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sup>②</sup>客座教授合作院校多為中國頂尖院校，但也不乏西部欠發達地區高校，以及其他亞聯董重點扶持的小型院校。

### (三) 圖書館支持計劃

圖書館支持計劃是 20 世紀 80 年代亞聯董投入最多的項目。1980 年，亞聯董重點支持四川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兩校分獲初始經費 10 萬美元。亞聯董資助兩家圖書館購置數千本外文書籍，訂購 400 種多語種的人文社科期刊；向圖書館提供複印機、視聽及縮微膠卷機器、微型計算機等設備，以促進圖書館的現代化。另外，亞聯董在五年內資助 24 名館員在美國和日本學習，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sup>③</sup>截至 1990 年，兩家圖書館各得到亞聯董資助 65 萬美元，兩館在當時中國圖書館中名列前茅。<sup>④</sup>亞聯董也向其他機構圖書館提供小額資助，比如資助北京外國語大學建立英語文獻收藏庫，資助武漢大學開展圖書館專業教師培訓班等。<sup>⑤</sup>1990 年以後，亞聯董對圖書館領域的投入大幅削減。

### (四) 英語教學計劃

英語教學計劃是 20 世紀 90 年代亞聯董在華支持力度最大的項目。亞聯董於 1991 年在南京大學設立語言教學中心，每年選派兩名美籍教師與南大教師合作開展英語教學工作，同時提供教科書等教學資源。亞聯董每年的資助額在 6~7 萬美元之間，南京大學則為外籍教師提供免費住宿。從 1992 年起，亞聯董招募並資助中外教師開展為期三周的非學位暑期英語培訓課程，並提供課本等教學資源。培訓點前三年在東北師範大學，後兩年在首都師範大學，其後是陝西師範大學。另外，愛德基金會則在亞聯董的支持下，部分或全部資助 5~10 名北美教師來華開展英語教學。弗里曼基金會也決定，在 1997~2000 年每年向亞聯董提供 10 萬美元，資助北美高校畢業生到亞聯董合作的高校教英語。<sup>⑥</sup>亞聯董英語培訓計劃的主要項目在 2000 年以後終止，此後只提供小規模支持。

### (五) 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計劃

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計劃是 2000 年以後亞聯董的重點項目之一。亞聯董在該項目上投入巨大，僅 2003~2004 年度預算就超過 26.3 萬美元，佔當年教師和領導力發展預算總額的 48.9%。亞聯董將貴州各級師範院校作為重點扶持對象，2003~2004 年度撥款 3.5 萬美元，2004~2005 年度增加到 8 萬美元。主要支持貴州師範大學針對地方院校開展教師訓練，資助貴州師範大學教師赴香港訪學，支持南京大學為貴州教師提供碩士教育機會，資助重點大學博士生到貴州高校支教一年等。<sup>⑦</sup>此外，亞聯董還策劃了一些針對包括貴州在內、中國各地欠發達高校的項目。比如資助欠發達地區高校教師赴海外攻讀碩博士學位，資助重點大學教師赴欠發達地區高校短期教學，為欠發達地區高校教師開辦暑期培訓班，加強重點大學與欠發達地區高校之間的聯繫，等等。<sup>⑧</sup>

### (六) 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計劃

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是 2000 年以後亞聯董重點推行的另外兩種項目。早在 1996 年，亞聯董即向魯斯基金會提交中外宗教學學者互訪的資助提案，三年內每年為中國宗教研究單位提供經費 10.9 萬美元。<sup>⑨</sup>同時對中國高校宗教哲學書籍購買、著作翻譯與出版等亦大力支持。2001 年，亞聯董將宗教研究列為重點項目。2003~2004 年度，亞聯董對中國宗教研究撥款總額為 25.675 萬美元，僅次於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項目支出。具體包括資助大陸宗教學師生出境訪學或接受培訓，資助北美宗教學學者赴華做客座教授，資助大陸高校開辦宗教研究研討班，資助香港高校宗教學研究

以惠及內地高校等。神學教育方面,從 2001 年起亞聯董撥款補助給金陵神學院的美籍教授,資助金陵神學院教師在兩岸三地攻讀道學碩士學位,鼓勵高校宗教學學者及神學院教師對話與合作,推動重點高校宗教學學者為神學院教師提供學術培訓。<sup>⑳</sup>

#### (七)其他項目

除了上述重點項目,亞聯董還不定期支持各類其他項目。比如邊疆計劃,在 20 世紀 90 年代前期,亞聯董與延邊大學和雲南少數民族研究機構有小範圍合作;1990 年代後期,亞聯董在青海師範大學開辦教師培訓班,為拉薩歷史檔案館培訓初級檔案工作者,並資助西藏 4 所院校教師在東部高校攻讀碩士學位。<sup>㉑</sup>再如藝術交流,在 1980 年代初亞聯董就曾資助北京中央樂團與波士頓交響樂團、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與休斯頓芭蕾舞團等中美藝術團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後來對上海音樂學院等藝術院校人才培養和演藝活動有所支持。<sup>㉒</sup>女性研究支持方面,1990 年代以鄭州大學為代表的一些女性研究中心被亞聯董納入資助之列<sup>㉓</sup>,亞聯董還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提供獎學金,支持她們在泰國攻讀碩士學位<sup>㉔</sup>。會議支持方面,亞聯董不定期地資助特定議題的學術會議,比如 1988 年的全國哲學會議、2004 年的亞聯董訪問學者會議等等。此外,亞聯董還致力於培育亞洲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項目,曾為菲律賓德拉薩爾大學和韓國西岡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提供連續支持。<sup>㉕</sup>

### 四、推動中國高校融入亞洲體系

新世紀以來亞聯董的發展趨勢之一,是將中國納入整個亞洲高等教育體系,建構亞洲高校聯繫網絡。因此,亞聯董在制定計劃方案時往往通盤考慮,試圖將亞聯董在亞洲各國的項目納入統一規劃的軌道中來。2001 年,亞聯董在願景聲明中增加了兩項內容:“亞聯董強調兩項優先工作,我們支持教職員、管理者、託事會成員的職業訓練,支持亞洲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聯繫和網絡。”<sup>㉖</sup>亞聯董在 2003 年會議上再次強調這兩項重要舉措。上述聲明反映出亞聯董政策的重大轉向。亞聯董的高校聯繫網絡面向的是整個亞洲,但因中國的重要地位,中國因素往往被特別考慮。就亞聯董中國委員會而言,努力的目標則是要將中國高校納入亞洲高等教育體系。

亞聯董將其亞洲聯繫網絡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管理網絡,所涉計劃由亞聯董策劃和支持。比如亞洲基督教教師團契,為來自亞洲的基督教和世俗機構的基督徒教師提供一種聯繫手段。再如亞洲學生基督教音樂節,亞洲多所高校學生在香港以音樂為媒介聚會交流。其二是夥伴網絡,包括校友網絡、中國機構網絡、宗教網絡、婦女與性別研究網絡等等。校友網絡旨在加強高校與畢業生、尤其是海外的聯繫;中國機構網絡意在加強中國高校內部學者聯繫;宗教研究和女性與性別研究則通過學術會議的形式,將各國相關領域的學者匯集在一起,建立學術網絡。其三是支持網絡,主要支持亞洲高校開展某些項目,比如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北京商業倫理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機構,與印度幾所高校在科研和教學方面合作網絡。<sup>㉗</sup>

為了實現教師及其領導力發展、亞洲高等院校之間網絡聯繫兩大目標,亞聯董於 2003 年制定了如下幾類指針性方案,所涉對象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合作夥伴:

第一類是亞聯董主理計劃,由亞聯董與亞洲各機構合作策劃和實施。雖然亞聯董此前也策劃過此類性質的計劃,但大都不成系統或缺乏明確目標。從 2003 年起,亞聯董將新策劃的三個子計劃歸於此類,分別為亞聯董高校領導力訪學項目、亞洲高等教育領袖研討會項目和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究院計劃。三個子計劃是對以往亞聯董相關項目的重新設計,這些新計劃目標明確,易於操作,效果明顯。<sup>㉘</sup>

第二類是亞聯董合作夥伴計劃,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學院發起和管理,亞聯董在資金、構想、策劃、評估等方面予以協助。這些計劃包括師生交換項目、教會大學合作項目、婦女研究網絡、校友網絡、亞洲基督教教師團契、亞洲教師進修獎學金等等,絕大多數為開展多年的傳統項目,且與前述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網絡有所交叉。這些項目中,亞洲教師進修獎學金受到亞聯董重視且持續多年。該計劃支持相對落後的高校中的低學歷教師,到亞洲重點高校攻讀碩博士學位。<sup>48</sup>

第三類是亞聯董支持計劃,由亞聯董在亞洲的合作高校設計和實施,亞聯董予以支持。這些傳統項目所涉範圍十分廣泛,資助高校教師攻讀碩博士學位、資助教師外語學習、支持特色課程發展、支持圖書館建設、資助某些具體研究課題、資助舉辦學術會議、支持開展服務性學習等均在此列。比如,圖書館建設曾是亞聯董長期支持的重點,新世紀以來支持形式發生變化,電子書、學術期刊、交互式講座課程、公共數據庫等網絡教育資源受到重視。<sup>49</sup>

2008年,在亞洲合作夥伴的推動下,亞聯董決定支持三項新的主題計劃,分別為環境與健康、宗教間理解與和平建構、地方知識。亞聯董幫助合作高校開發相關課程,讓學生參與研究過程。<sup>50</sup>這些跨學科課程,有利於促進不同學術部門、不同機構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此外,還有一些零散存在的計劃,最初僅在少量亞洲高校試行,後來被亞聯董廣泛提倡,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服務性學習計劃。該計劃為師生提供本國或鄰國社區服務點,以加強他們對其他信仰、文化和社會的經驗性理解。在中國,亞聯董與愛德基金會開展服務性學習計劃,主要在人員訓練、項目評價、艾滋病防護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sup>51</sup>雲南大學的鄉村社會計劃就是服務性學習計劃的典型,師生在社區服務中獲得高質量的田野經驗。<sup>52</sup>

2012年,亞聯董引入全人教育的理念,不久將其作為核心理念統攝全部亞洲計劃項目。全人教育是北美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即已提出的教育理論,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亞聯董認為,全人教育理念注重價值而非排名,注重質量而非數量,完全契合亞聯董的宗旨和目標。亞聯董正在開展的項目與全人教育理念完全一致。因此,全人教育為亞聯董開闢了一條道路,即通過與合作夥伴的共同努力,幫助學生準備好他們未來的生活。<sup>53</sup>到了2014年,亞聯董已經明確將全人教育作為工作核心。亞聯董以全人教育為核心,將全部計劃分為5個類別。第一是高等教育領導力發展,包括亞聯董高校領導力訪學項目、亞洲大學領導計劃、戰略規劃和資源開發等。第二是促進教學、學習和研究的教師發展,包括亞聯董教師獎學金計劃、教師提高計劃、亞聯董訪問講師計劃等。第三是校園夥伴,包括服務性學習計劃、和平教育計劃等。第四是亞洲文化與宗教,包括宗教間理解、當地知識、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究機構等。第五是特別新計劃,包括翠竹補助計劃、指定贈款和捐贈計劃、美國學校和海外醫院計劃等。除開展小額資助的翠竹補助等極少數計劃為新增內容外,絕大多數都是之前計劃的延續和改進。<sup>54</sup>

亞聯董認為,全人教育應該致力於發展健全的公民,在課堂上要鼓勵批判性思維,並引導學生關注課堂之外的社區需求。高校有責任將學生培養成多維度、全面發展的人,而不僅僅是未來的勞動力。亞聯董堅信,全人教育可以為亞聯董合作的亞洲大學學術注入活力。其中一些大學已經將這些目標轉化為實踐,比如香港浸會大學、菲律賓西利曼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印度杜克夫人大學等都從不同角度開啟了全人教育課程。<sup>55</sup>2017年9月,亞聯董還嘗試創辦全人教育學院,並在菲律賓奎松市的雅典耀大學試點。同月,亞聯董召開“全人教育作為未來之路:亞洲的挑戰與展望”主題會議,來自10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4所高校的代表以及亞聯董託事會成員與會,全面探索了全人教育的持續優勢及其對當代社會變動做出反應的方式,進一步為此後的亞聯董項目規劃明確了



方向。<sup>56</sup>亞聯董的中國項目也融入亞洲規劃的體系，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 五、結語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大致可以看出其總體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亞聯董著力於與中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採取淡化自身宗教背景和宗教屬性的政策，堅持在中國法律和教育制度的框架下開展工作，其規範低調的行為符合中國官方的預期。亞聯董將中國賠償資金的大部分返還給中國，主要用於圖書館建設、高校教師培養、客座教授支持、文化藝術交流等方面，開展的計劃大都符合中國教育發展的切實需要，故而贏得了中國社會的信任和支持。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亞聯董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致力於建立一體化的亞洲高等教育合作體系，並試圖將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之中。事實上，自1950年代亞聯董已經將視野擴展至亞洲各國，1980年代亞聯董的在華項目大多是亞洲其他地區相關項目的複製或拓展，而1990年代的中國項目與其他國家更具同步性。2000年以後，亞聯董對自身機構進行改革，在人員構成、組織運作、項目規劃等方面更加亞洲化，在制定項目規劃時也更注重全域性。亞聯董試圖建構亞洲教育發展網絡，這個網絡並非只是亞聯董對亞洲各國高等教育的支持，而且還包括亞洲各國受助單位和個人之間的廣泛聯絡，中國成為這個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不過，由於中國高校在亞洲教育中的規模和地位，中國大陸始終是這個網絡中舉足輕重的力量。而香港因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和高度的開放性，成為亞聯董溝通亞洲各國的重要紐帶城市。

亞聯董在華順利發展，一方面源於其對自身的準確定位和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亞聯董始終堅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和教育制度，設計工作項目時以中國高校的需求為出發點，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亞聯董具有普遍的包容性，雖然它並不否認自身的基督教性質，但從未因此排斥基督教世界以外的領地和人群，亞聯董無差別地為了中國教育的福祉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這也是順應了中國教育發展潮流的結果。提升中國高校教師素質、促進中外學術與文化交流、扶持弱勢高校和學科發展、加強高校基礎設施建設等舉措並非亞聯董的發明，而是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學習亞洲乃至全世界優秀的教育模式，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先進的教育經驗，積極融入全球教育與合作網絡，同樣也是改革開放格局下中國政府長期奉行的方針。因此，亞聯董參與並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但並非這一進程的主導者，其成績和貢獻值得肯定，但不應誇大。

在改革開放的格局下，海外文教公益組織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素來為中國政府所肯定。只要這些組織抱有真誠的目的，與中方持有共同理念或契合點，遵守中國法律及理解中國國情，願意在中國政府領導的文教框架下開展工作，均可有較好的發展態勢。

---

① 參見網址 <https://unitedboard.org/about-us/our-network/>。代表作有 William P. Fenn,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2-1975*, North Newton, Kansas: Mennonite Press, 1980; Paul T. Lauby, *Sailing on Winds of Change: Two Decades in the Life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69-1990*,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96; 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肖會平：《合作與共進：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組織對華活動研究（1922-1951）》，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這些著作中，涉及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在華狀況者僅為 Paul T. Lauby 著作的第 10 章，所涉時段為 1980~1990 年，此後的情況付之闕如。

②③④William P. Fenn.,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2-1975*, pp. 14-20; pp. 30-33; pp. 50-53.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Paul T. Lauby, *Sailing on Winds of Change: Two Decades in the Life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69-1990*, p. 9; pp. 81-83; pp. 86-87; p. 85; p. 94; pp. 94-95; p. 111; pp. 100-103; pp. 105-107; p. 89; pp. 55-80; pp. 104-105; p. 96; p. 111; p. 98; pp. 92-93; p. 99; pp. 90-91; p. 94.

⑳㉑China Program Subcommittee Minutes, February 4, 1998,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㉒㉓China Concerns Subcommittee Minutes, June 3, 1998,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㉔Chin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inutes, June 6, 1994,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㉕China Program Subcommittee Minutes, June 14, 1999,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4.

㉖China Program Committee Minutes, June 18, 2001,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5.

㉗㉘㉙㉚China Program Report on 2003-2004, Recommended Budget, 2003-2004,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6.

㉛㉜㉝Executive Summaries of Mainland China Proposals, 2004-2005,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6.

㉞㉟Horizons, December 2014, p. 9.

㊱Executive Committee Actions, March 22, 1991,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f B2 F14.

㊲Chin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inutes, June 14, 1993,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㊳㊴㊵China Program Subcommittee Minutes, February 13, 1997,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㊶Chin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inutes, June 19, 1995, Archives of the UBCHEA, RG11i B5 F3.

㊷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11, 扉頁。

㊸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03/2004, pp. 11-12.

㊹㊺㊻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04/2005, pp. 5-13.

㊼㊽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08-2009, p. 2; p. 13.

㊾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07, p. 13.

㊿Annual Report of UBCHEA, 2012, pp. 4-5.

㉀參見網址 <https://unitedboard.org/programs/learn-whole-person-education/>

㉁參見網址 <https://unitedboard.org/>

作者簡介:徐炳三,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武漢 430079

[責任編輯 陳志雄]